

東山文史資料



82

東山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福建省東山縣委員會文
史資料工作組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目 录

同宗共祖 骨肉情深

——谈东山和台湾的渊源关系.....孙用奇 孙英华 (1)

东山华侨史实鳞爪.....洪干堂 (9)

东山岛地理和地貌形成史迹.....张应明 (19)

略谈东山岛的开发.....孙英华 (27)

从《仙桥记言》碑刻的发现谈郑成功进驻铜山卫所史实
.....孙汉波 (35)

先贤文三俊诗八首.....陈秋顺 (38)

爱国思乡的诗篇.....洪干堂 (41)

东山歌册.....东山县文化馆 整理 (43)

东山昆腔点滴.....黄西田 (47)

同宗共祖 骨肉情深

谈东山和台湾的渊源关系

孙用奇 孙英龙

东山和台湾一水相连，两地同胞，同宗共祖，血脉相承。自古以来，交往频繁，关系密切，情同手足，源远流长。

早在十六世纪，明朝政府为使台湾不受外来侵犯，曾设置防卫，屯兵驻守。这时，东山就陆续有许多人移居台湾。据福建史料记载：明万历年间，明政府为保卫台湾，曾设“澎湖游兵”，调东山、南日、浯屿、南沃、海坛等水寨官兵，进驻澎湖，据险戍之。铜山（东山旧名）水寨官兵称“铜山营”、“铜山兵”，三年换防一次。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保卫宝岛捐躯殉国，有部份人就留居下来。后人诗云：“重洋百里戍台湾，猛甲澎湖递换班，二百年来人事变，征夫休唱念铜山。”

明朝末年，民族英雄郑成功进驻东山，在岛上招兵募饷，操练水师，监造战船，建立军事基地，把东山做为收复台湾的据点之一。当时，东山有许多人参加郑成功的部队，并随军征战台湾。据《东山县志》“铜山人民抗清斗争史略”记载：“一六六一年（清顺治十八年，郑成功率舰开发台湾，铜山有五百多名男女自愿随往”。他们参加郑成功东征收复台湾后，部份人就留居下来。前何村何氏族谱也

记载：“明末郑成功抗清，在变乱中九世祖（何仕达）及十世祖（何文懿）部份迁居台湾”。

明清以来，东山又是大陆和台湾通航、通商的重要港口。据《东山县志》记载：“清朝时，商人集巨资驾帆北上而至宁波、上海、天津，东驶台湾、澎湖……”。证明东山很早就和台湾进行通商贸易。抗战胜利后，两地贸易往来更加频繁。那时候，有上百艘大船往返于台湾和东山之间，如“开荣号”、“清河号”、“文周号”、“金甌美号”等。他们到台湾停靠的港口有高雄、台南、东港、东石、基隆、马公、布袋咀等处。从东山载运竹器、瓷器、土纸、香烟、米粮、酒类等土特产到台湾，又从台湾运回白糖、水果、苎麻、桐油、黄麻、花生饼等货物。象这样互通有无的物资交流，在当时对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，方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由于两地同胞的密切往来，促使许多东山人到台湾定居，从事经商、行医、捕鱼、造船、补网、运输、做饼、开点心店等各种职业，为开发台湾做出贡献。在此期间，也有一些台湾籍同胞到东山来定居，两地亲人往来此往，十分频繁。

移居台湾的东山人，时刻不忘祖籍，更不忘来自祖地的乡亲，那时候，不管东山去的船只停靠在什么港口，都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和热心的帮助，每看到祖地来的乡亲，他们总是用闽南话亲切地招呼说：

“祖家乡亲来啦！”有的争着请到家里做客，叙谈祖家近况；有的热情帮助推销货物，代购带回大陆的物品。高雄有一家《公成船头行》，主人叫林水勇，东山的乡亲都叫他“水勇大”。“水勇大”原是东山人，清代到澎湖“铜山营”当兵。退伍后在澎湖建家立业，不久又搬到高雄开设船头行。每当东山的乡亲一到，“水勇大”总要盛情款待一番，并协助处理商务，给祖家乡亲提供一切方便。“水勇

大”去世后，儿子林成仔继承父业，三个孙子也不例外。祖孙三代人，代代不忘祖，他们的心和故土亲人紧紧连在一起。

东山和台湾的历史渊源关系，在岛上发现的许多碑刻上也留有证据。官前村发现一支清康熙二十四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本《关于敕赐天后宫榜文》的木碑刻，碑上记载着当年大陆船只从官前海湾出发航行到台湾的史实，还载有官前村天后宫旁的一口井，系当年供给开赴台湾的官兵饮水之用，证明官前海湾是当年东山和台湾通航的一个重要港口，因该地人民为开发台湾有功，受到康熙皇帝的敕赐。城关镇原“观音亭”旧址也发现一支清康熙年间“苏公德政碑”，记载当年守卫东山的官舰保护台湾海峡通航的事迹。城关镇关帝庙内一支重修武庙记的石碑上，记载着台湾各界人士捐资修建武庙的名字和金额。该碑长五尺、宽八尺，镌刻有“清朝同治九年岁次庚午秋菊月兴工所有捐收芳名列明”字样，记载台湾安平（台南）、沪尾、郡城、澎湖、鹿港、晋邑等地四十多位军、政、商、渔、航各界人士捐款名单和金额。这支碑刻充分证明当年台湾和东山两地人民频繁往来的是实，表达了移民台湾的东山乡亲不忘祖籍，眷恋故土的深情厚意。

经过查证，东山岛的城关、港西、坑北、留田、湖尾、马銮、东沈、岱南、店宅、前何等城镇和村庄的乡亲，自明清以来就有许多人先后移居澎湖、高雄、台南、台北、屏东、基隆、东港、淡水、嘉义等地。澎湖、高雄部分林姓乡亲的祖家就是港西村；屏东林投巷部份陈姓乡亲的祖家就是留田村；嘉义、淡水和台北附近田中央村部份王姓乡亲的祖家就是坑北村；澎湖部份陈姓乡亲的祖家就是城关镇。他们移居台湾后，一直沿袭祖家的乡土民情、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。台北、基隆、澎湖马公和小卷等地乡亲，曾经聘请康美村建筑师林进金、林进添等人前往兴建关帝庙，其结构布局，完全仿照东山关帝

庙的样式，表示他们不忘祖籍。每逢关公生日和传统佳节，东山籍的乡亲便自发聚集，迎神赛会，上街游行，其盛况与祖家相同。分居到台湾各地的东山人，还以东山乡社为单位，组织“东山会馆”、“同乡会”、“宗亲会”轮换地点，定期集会，摆宴同乐，畅叙乡情。

移居台湾的人，世代不忘祖在大陆，根在东山。新中国成立以前，他们经常回到祖家探亲访友，祭祖扫墓，相互之间，频繁往来，感情深厚。

港西村人民在明朝就陆续移居到澎湖、台南、高雄一带，他们在台湾各地建设和港西相同式样的房屋，墓碑上还要刻上祖籍港西的字样。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每年都有人回祖地探亲，每次返台都依依不舍。有一年，林正雄的大伯林顺池、二伯林顺港和他们的妻子，一同回港西省亲会友、祭祖坟，亲手为祖先墓地培土植树，还在墓前挖了一口池塘，当年他们从台湾带回港西的油漆木箱、藤笼、木盘（底部写有金色“双喜”字）一直被港西乡亲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着。

留田村人民早在明朝就到屏东县林投巷开基创业，至清光绪年间就繁衍到一百多户。当时，留田要建一座陈氏祖祠，派陈厂仔当信使到台湾通报。林投巷的留田乡亲表示说，我们是留田的子孙，建祖公祠堂我们要添砖加瓦。就这样，一百多户全部捐款献物，用一只台湾木箱装着，由陈厂仔带回留田，作为建祖祠的经费。至今，这座祖祠依存，那只台湾木箱也由陈厂仔的后代珍藏着。

清朝康熙年间，坑北村秀才王养仔，考上武举人后，带了一批坑北人到台湾开基，先在淡水居住，后逐渐发展到嘉义。从那时候起，坑北乡亲移居台湾的越来越多。同治年间，该村青年王马体也到台北附近开基建村，叫“田中央”。他到台湾后，不忘祖地故土，曾寄钱

回祖家建造一座房子，被坑北乡亲叫做“台湾厝”，有一年，他回坑北时，还特地“在台湾厝”前种了一棵榕树作纪念，坑北乡亲把它叫做“台湾树”。

历史上有同宗共祖的乡亲关系，现实中更有血肉相连的骨肉之情。一九五〇年初，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时，东山有四千四百七十八人随往。他们当中，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，有被抓兵拉夫的各阶层人民群众。三十多年来，他们遥寄宝岛，情牵梦绕，乡思绵绵，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日日夜夜盼归期。可是，由于人为的藩篱，致使两地亲人，天各一方，断绝往来，实为人间之不幸。然而，海峡隔不断骨肉情，多少年来，彼岸游子思乡怀亲恋故土，祖地家人望穿秋水盼亲归，其感人事例，不胜枚举：

城关的肖××先生，身居异地，思乡情切，经常在惆怅之时，赋诗题词寄托对故乡的思念深情。他曾为《星洲东山会馆四十周年纪念特刊》一书题词曰：“石斋故里是吾家。”表达他怀念家园，眷恋故土的心情。他又在一首题为《忆桃花源——怀故乡》的诗中写道：

桃花源上锁深烟，蹊径未通千百年，
渔子问津今绝迹，骚人买棹早无缘；
柳暗花明犹在望，山回路转未能前，
世外桃源何处是，空余惆怅在人间！

逢年过节，肖先生的乡思越发浓烈。有一年中秋夜晚，皓月当空，他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，又一次激起了无限的思乡之情，于是，挥毫写下一首题为《壬辰中秋月夜乡居有感》的诗，表达内心的乡思乡愁。诗云：

不堪回首话神州，客地平添几许愁！
佳节频临难遣此，举头明月又中秋。

陈城村的陈××先生，自幼母亲不在身边，父亲代替母职，养育他长大成人，十八岁时不幸被抓兵去台湾。三十多年来，他为远离家乡，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而每每伤感。前年得悉父亲病逝的噩耗，悲痛欲绝，由于海峡阻隔，使他无法回来为父亲治丧守孝，在悲恸中挥泪为家中亲人写了一封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的家书，同时寄来一张本人相片，叫家人把它在父亲灵前焚化，以表示他要终身伴随老父。

西崎村的许天文先生，在台不幸病故。临终前，他对同乡好友嘱咐说：“我生为东山人，死做东山鬼”。我死后，请你们设法把我的骨灰运回老家安葬。”他旅居新加坡的母亲谢宝珍老太太得讯，特地专程到台湾，按照儿子的遗嘱，千里迢迢，几经辗转，把儿子的骨灰运回家乡安葬。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，西埔圩的林××先生，听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播送《今日西埔镇》的通讯，非常高兴。对来自故乡的消息，他视为难得的佳音，立即用录音机把它录制起来。过后，每当思乡情切之时，就拿出来放放听听，以解其乡思乡愁。东山的乡亲每到他家，林先生总要把这一消息传放给他们知道。大家听了来自家乡的信息，无不感到格外亲切，万分快慰。

去年，一位华侨到台湾办商务，带了东山盛产的紫菜去赠送亲友。在台的乡亲都亲切地把它叫做“思乡菜”。作为珍贵的佳肴，互相转赠。家乡人吃了多年未曾尝到的家乡菜，牵动了无限思乡情，许多人触物伤感，为自己年事增高尚不能返回故里西凄然泪下。

一个个满腹离愁别绪的天涯游子，一桩桩表达离人思归的感人事例，反映了海峡彼岸的东山人盼望早日拆除人为藩篱，尽快实现和平统一的心声和迫切愿望。这种心声和愿望也发自东山岛上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有亲人在台湾的人家。

为了怀念在台湾的亲人，许多人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，冬至吃糖圆要为台湾亲人留晒糯米粉浆；除夕围炉要为台湾亲人多摆几盘，安排座位；兄弟分房要为台湾亲人留下一份；青年人结婚办喜事要为台湾长辈寄送“金枣茶”（用金枣罐头代替）；许多情深义重的妻子，三十九年如一日，留家守节盼君回，尽管失去了青春，额白了双鬓，也始终坚贞不渝，耐心等待。

老家钱岗的孙××先生，从小和童养媳何××一起生活，两人青梅竹马，感情至深。一九五〇年，母亲看他俩年岁已大，准备婚事，准备年底为之完婚。为此，家里专门养了两头大猪和一只公羊，以备举办婚礼时宰用。可是，就在这年三月，孙××却被国民党抓去台湾，从此音信杳然。三十多年来，何××坚持留在孙家，孝敬公婆的婆婆，拉扯年幼的小叔，年复一年，苦苦等着！盼着！岁月流逝如流水，时间一年年过去了，直至今，还不见未婚夫回家来。婆婆同情她的遭迁，怕她误了青春，曾多次劝她改嫁或招赘，村里许多好心人也纷纷前来说媒和求婚。然而，何××怎么也不肯。她只有一个心眼：就是要等孙××回来成亲团聚。象这样情操高尚，心地善良的女性，在东山岛去台人员亲属中，岂止何××一人！

海峡有限情无限，月亮有缺必有圆。一九七九年元旦，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，实现和平统一九条方针政策的发表，象温暖的春风吹开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扉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，冲破台湾当局的高压锁和阻挠，通过各种渠道，沟通联系，增加了接触，互相往来，返乡定居。许多台湾渔民在海上和东山渔民同场作业，直接交往，互送礼品，共叙乡情，有难相帮，遇险互救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几年来，有二百三十五艘台湾渔船，一千五百六十六位台湾渔民前来东山港停

靠，他们来自澎湖、高雄、台南、屏东、基隆、台北等地。有来避风修船，补给物资的；也有来会亲访友，寻根认祖的；还有来旅游参观，洽谈生意的。每次到来，都受到东山台湾渔民接待站的热情招待，使他们深感祖国大陆的温暖。几年来，还有二十位东山籍的去台人员先后通过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等迂回途径，辗转回到家乡，其中有的叶落归根，返回故里定居，与分离三十多年的亲人团聚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。

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都说明：东山和台湾连根并蒂，血脉相承，骨肉情难断，骨肉思团圆，海峡两边的东山人，心相同，语共音，愿藩篱快拆除，盼航道早开通，让历史形成的密切渊源关系再续新篇！

东山华侨史实鳞爪

洪干堂

一、出国时间探索

东山人出国谋生始于何时？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研究、分析推论，较可靠的大约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。具体事例分述如下：

（1）东山人旅居新加坡：清咸丰年间（一八五一年），风灾严重，年景不好，民不聊生。康美人林瑞仔从铜山港（今城关）乘“大得利”帆船去新加坡，不久回来，乡人闻之，皆相率到新加坡谋生（距今已一百三十年）。

公元一八四五年，康美乡受灾荒，有十三人乘船出国谋生（距今已一百三十六年）。

城关旅居新加坡的华侨陈金华，是当地知名人士。他出生于新加坡（二十年代逝世）。陈的祖母是由东山城关往新加坡的。据此推论，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年以上。

（2）东山人旅居马来亚：东山华侨名人薛佛记的“薛家族谱”记载：薛（佛记）字文舟，乾隆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年）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六甲（推至其父母辈，距今已有二百余年）。

（3）东山人旅居越南（旧称安南）：据城关刘氏家谱记载：刘桂在清朝乾隆年间到安南谋生，居住十三年后回国结婚。时值乾隆年间（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）距今约有二百一十年。

(4) 东山人旅居印尼：由于中国与印尼相距较远，其时水上交通工具落后，东山人去印尼的历史较短。根据印尼华侨反映：城关南门黄秋南（旅居印尼华侨）的父亲黄朴，是最早到印尼爪哇岛的东山人（距今约有一百来年）。

据国外华侨界传说，东山人出国谋生，远在清朝康熙甲辰年间（一六六四年），清政府对沿海百姓实行迁界移民时逃往南洋的。据此，出国至今已有三百一十八年了。

东山人出国谋生较多的时代，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（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），南洋群岛未被战火波及，工商业很发达，商人有利可图，农工阶层亦受其惠，故当时称为是南洋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战后，东山人在厦门经营二间客栈，出国较方便，船旅费低廉（每人只收银元二十元左右）。其时又因国内军阀混战，时局动荡，人民谋生困难。人们羡慕南洋生活好过，于是，大批东山人涌到南洋。据康美乡调查所得，一九三三年因灾荒而出国的就有五十余人。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，海上交通阻隔，出国谋生的人便似凤毛麟角了。

二、出 国 的 原 因

从历史上看，出国谋生并非一件乐事，而是离乡背井、生离死别的悲惨遭遇。绝大多数人都是因贫穷，无以为生；或者是受不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逃壮丁，避债务，反抗封建婚姻等原因而出洋的。

(1) 因政治原因出国：如清朝时，梧龙乡人“小刀会”首领林美圆，因反抗满清暴政，率众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于一八五三年与一批起义者逃往新加坡。以后，林在新加坡组织“义兴公司”，有所活动。

(2)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为发动内战，大抓壮丁，青壮年为逃避抓兵而出国的，城乡各地，比比皆是。

(3) 旧社会苛捐杂税繁多，加上天灾人祸导致经济破产而逃之出国的占大多数。如上述康美乡人的出国情况就说明这个问题。又如山只乡林如源一家五口，以农为生，因向黄山村富户林天然借款五百元治丧，一年倍利，无法偿还，遂逃国外。

(4) 旧社会，重男轻女之风甚盛，特别是农村，养“童养媳”盛行，因包办婚姻，常引起家庭不睦，使妇女失去家庭温暖。旧东山岛“三灾”（风灾、沙灾、旱灾）多，百姓生活艰苦，常以番薯野菜充饥。而妇女更惨，没有社会地位，劳动负担重，食不饱腹，衣不暖身。在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，遂相率到国外做苦工、当女佣。正因如此，现在我县归国华侨女性居多。城关地区则例外，出国者多是男的，妇女只是少数。

此外，明清时期歧视华侨，清政府称国外华侨为“奸民”，称载人出国是“载臭柑”。还有，乘帆船漂洋过海，得冒极大风险。据历史记载：清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年），东山“李德义”号帆船运载数十人出国，船在城关南门海边出发，啼哭声连天，情景惨然。据说：“李德义”号驶至“万里长沙”（今西沙群岛）遇台风，乘客多罹难（史载：一八七三年古历六月二十七日刮大台风）。

三、分 布 地 区

据东山侨联会多年调查所得，我县旅外华侨（包括后裔）分布地区如下：新加坡最多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，其次是马来亚（包括沙朥越），印尼又次之，越南、泰国、菲律宾、缅甸、柬埔寨等国较少。最近查悉，还有少数人旅居于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瑞士、荷兰、

阿联（亚丁埠）、圣诞岛等。

我县旅居新加坡的华侨，多数聚居于小坡一带（非中心商业区）；在马来亚的，则分布在新山、小笨珍、文律、步来、峇株巴辖、巴生坡、居銮、吡咯等地。居北马的甚少；在沙朥越的，则分布在木胶、古晋、诗巫、峇南、拉叻等地；在印尼的，多聚居于爪哇岛，如万隆、雅加达、三宝瓏、井里汶、直葛；在苏门答腊的，则分布在巨港、棉兰、亚沙汉、宁岳等地。据悉，我县华侨居于沙朥越和印尼的多数为城关人，农村的较少，如有则多居于印尼的廖内岛、武廊等地。

四、创 业 安 居

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，东山华侨深深懂得寄人篱下的痛苦。他们热爱祖国，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爱国行动，已尽人皆知。他们身处逆境，富于艰苦创业精神，经过二百余年的不断奋斗，逐步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，并涌现一批被人传颂的优秀人物。

东山人早期出洋谋生的多数是劳动人民，其间也有少数是知识分子。如旅居印尼的满清举人马徵祥（曾任爪哇某报社编辑）、旅居缅甸的贡生江之永（任过仰光中华学校校长）旅越华侨张大江、陈宝善、许粹侯等都是满清秀才。还有后林人林革生也曾任印尼苏岛任报社编辑。

现在，东山华侨的职业大部份是工人（包括产业工人和杂工）、店员、小商贩、教师、医生、公务员、船员，仅少数是资本家。工商业者中多数是经营建筑业的，部份人开办公司、工厂、行号，还有六人专营侨批业的（共开设六间信局，对我们争取侨汇作用颇大）。还有个别是操特殊职业的，如传教士、道士、和尚、江湖术士等。

溯自十九世纪以来，东山华侨曾出现了如薛佛记（一七九三年至一八四七年）这样的杰出人物。一八三〇年前后，他领导当年“福建帮”的总机构“恒山亭”，薛是该亭五位大董事和五位总理事的最高领袖。他一生都在马六甲度过（今属马来西亚）。佛记次子荣樾是第一位长年经商往返于新加坡、厦门的英籍华人（一八八四年逝世于厦门）。

荣樾长子有礼（一九〇六年卒）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日报《叻报》的创办人。该报于一八八一年发刊，传及其子兆熊，至一九二三年停刊，足足发行了半世纪以上，对新加坡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。一八九二年，有礼被舆论界推举为市议员，但他推辞不予接受。

荣樾次子有文，任过汇丰银行买办。有文长子中华，热心于社会事业，曾受封为“太平局绅”，历任市政局长（一九一九年始）和中华总商会会长、福建会馆主席等职。

荣樾第三子有福，于一八七四年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试，名列前茅，尝官费留美进波士顿大学学习。一八八一年回国，旋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。一八八四年七月法国进寇福州马尾，有福见危授命，奋勇抗击法寇，终以身殉国，年仅二十三岁（见新加坡东山薛氏家谱）。

总之，薛佛记是新加坡“福建帮”的开山鼻祖，其家族不愧为星马华侨之名门。

在二十世纪初期，东山华侨林溪茂教授（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六七年）于一九六五年荣任新加坡大学第一任副校长，一九六七年逝世于英伦。他一生遗下著作十四部，大部份是有关经济学的理论著作。

二次大战结束后，东山华侨有多方面的发展，有的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和进步组织，有的当上市、国会议员、工人运动领导者等，最

近，雕塑艺术家黄明宗，年仅四十余岁即崭露头角，现为新加坡青年协会顾问，其作品常在世界很多大都市展出。

东山华侨很多人都热心于教育事业，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。佼佼者如南埔人谢联棠先生（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七四年）。他一贯热爱祖国，热爱家乡。一九二八年谢在新加坡开设“侨兴国货公司”，并在印尼苏岛兴办“苏东中学”。一九三一年在家乡南埔创办“南薰小学”，全校师资经费均由他负责。解放后，谢仍经常寄款资助办学，被乡人誉称为东山之陈嘉庚。还有在马来西亚的刘达溪先生，他在文律倡办“乐育学校”；在噶咯的黄献南先生，倡办“耕文小学”；还有新加坡的沈保发先生，自任“暨武德学校”董事。因办学成绩优异，特蒙新加坡总统封赐P.B.M荣衔。

东山华侨除自身艰苦创业外，还努力培养下一代，不少人的后裔都受过高等教育，负笈欧美，学有专长，成绩显著。有的还荣获硕士、博士学位等，堪与欧美人媲美，为祖国争光。他们身居异邦，心怀祖国，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。有的应邀回国讲学，如激光专家林耕华、电脑专家朱华等等。

在企业界方面，二十世纪初期，东山华侨先贤中，有陈金华先生（据说曾受封为太平局绅），在马来西亚丰盛港开采锡矿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为东山人所熟悉；实业家王水斗先生（坑北乡人），在南洋开设“新记成凤梨厂”，产品畅销国内外，并曾任南洋华侨中学第四届总理职务；旅居沙撈越的华侨知名人士陈起龙先生，曾任木胶中华商会主席，被当地政府委为“甲必丹”（华人领袖），至今达四十年之久，足见众望所归，其经营的工商业，亦曾显赫一时。

据笔者所知，三十年代聚居在新加坡的东山华侨还是寂寂无闻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只有城关人许岳东开设“源丰号米行，经